

伍伯與花關索

柳 存 仁

數年前愚撰“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一文，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第一期(1976；該文亦收入拙著和風堂讀書記，香港龍門書店印行)，曾引證及倫敦英國博物院所藏約明萬曆己酉(1609)喬山堂本之三國志傳文字(卷十三，葉八上半面)，敘關羽與于禁、龐德大戰時，龐德與伍伯二人駕小舟欲投樊城，落水，龐德被擒，伍伯沉死事。伍伯之名亦見同書他處(卷十三，葉五上半面)。在三國志傳中，伍伯似為專名，如卷十三葉六上半言“[龐]德手[按，“手”當作“首”。]將伍伯與關平戰到三十餘合；”同卷葉七下半言“龐德與董衡、董超、成何、伍伯左右軍百餘人立于堤畔；”似皆可證其為專名；然其實非也。拙文“附記一”云：

然伍伯亦可能為通名，非專名。後漢書一〇八“宦者傳”云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卷一一〇“文苑。彌衡傳”言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也。”然則此伍伯龐德之副官耳。(頁二三二)

各種版本之三國志傳多刻於明萬曆、天啓年間，其時代遠較通常所豔稱之嘉靖壬午本(1522)三國志通俗演義為遲，學者頗多以志傳一類本子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之簡本略本者，蓋僅據其刊刻時代推測，實未嘗細考其字句內容也。若研其內容，則志傳諸本之文字實當甚早，或更早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蓋其內容文字蕪陋，固遠不及嘉靖本之工細，宜其為人所懷疑；然頗富如伍伯一類較早時期使用之語彙，此其所根據之祖本寫作時期必更在前，乃得保存類此之典實，若僅從事鈔襲或就詳本而簡略之，則不能有此現象，而蘇陋腹儉之略本編纂者亦無從有此過時之知識也。後漢書外，今更從三國志本文及晉書中另舉一二例，說明伍伯之為通名，蓋為當時一般人之常識。三國志卷四十“蜀書。劉琰傳”云：

十二年(按，建興十二年，公元234)正月，琰妻胡氏之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五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慶遂絕。

道藏二〇一孝道吳許二真君傳係一半記事半傳說性質之道教傳記，其成書約在南北朝時。中有一節敘王敦殺郭璞事云：

……明日午時，王敦使五音兒收璞於河邊，欲殺之。屬水暴漲，遂殺不得，令引上，果到皂莢樹下。五音兒拔劍云：“吾昔得郭君錦袍一領，濟我飢寒，未有恩報，云何遇我殺之？身命委亂，今果相逢。”乃挺劍謂王敦曰：“無道之人，輒起兵作亂，枉殺平人，天必誅之。”（葉十上半面至葉十一上半面）

晉書卷七十二“郭璞傳”亦云：

[王]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

孝道真君傳所言有不易解處，參晉書大體可明。其行刑者據北堂書鈔卷一二九引續搜神記，太平御覽卷六九三引搜神記，及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二，皆有郭璞餽袍或贈袴褶之事（參晉書對注卷七十二），而太平廣記卷十三引神仙傳，則其人實為一伍伯。然孝道真君傳獨稱之曰“五音兒”者，“音”字實“百”字之誤，而伍百之作“五百兒”，蓋亦民間俗稱也。

三國志傳之作者或纂述者未嘗知伍伯之經歷，故誤以其為人名，且為龐德之首將。然其能不改伍伯之稱，留此一辭，遂為後人幸得據而考證之線索。行篋間未得檢嘉靖本，若坊本之三國演義蓋據清初毛宗崗本子者，第一百十五回敘劉琰妻事則言“琰疑其妻與後主私通，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于前，將妻綁縛，令軍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蘇，”則由一人而增至五百之數。雖然，如小說所言，琰妻或未必盡為五百人所撻，列前不過示威性質耳，不然，人各撻面數十，“幾死復蘇”，寧不謂為幸事邪？

伍伯不過一普通名辭耳，若言現在三國志傳一類本子其祖本定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吾人仍不得不依賴近歲(1967)在嘉定發現之明成化本說唱詞話中之若干關索傳，始得為之定讞。

索，若干版本之三國志傳內有關於關索之記載，多年前周紹良先生曾著“關索考”一文，刊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內（有1967年香港龍門書店重印本亦見1981年刊學林漫錄第二集），已先我言之。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無關索事，惟較早之元至治(1321-23)間建安虞氏新刊全相三國志平話卷下敘諸葛亮征南蠻時有關索戰太守呂凱事數句帶過，斯蓋關索一節見於通俗小說中之嚆矢也。其次則近歲

發現之成化說唱詞話，再次則各本之三國志傳。周先生著“關索考”時，成化說唱詞話尚未發現，然周先生已引三國志傳，且更從其他資料考證關索其人及其故事之流傳。據周先生轉述王古魯先生所見若干明萬曆或較後之三國刊本，如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乙巳(1605)閩建鄭少垣聯輝堂三垣館刻本新鐫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又名赤帝餘編)，萬曆庚戌(1610)閩建楊春元闡齊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日光慈眼堂藏萬曆閩書林喬山堂劉龍田刊本新鐫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及崇禎閩雄飛館刻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英雄譜)，皆有或多或少之關索故事。周先生文中曾引有聯輝堂本所敘若干節，其材料已恆為時賢所轉錄，茲不贅陳。愚前引論羅貫中講史小說性質之拙文，所引用之三國志傳係據倫敦博物院所藏不完全之喬山堂本，故未及關索情節。好學深思之士宜更謀得日本日光慈眼堂所藏之喬山堂本三國志傳悉錄出其文字與他本互作比較，或可於此一課題，獲得更多之發現也。雖然，今日所見諸本三國志傳誠有關索之故事矣，然各本刊刻之時日既無一不在嘉靖之後者，遽可輒謂志傳所敘之故事祖本定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者乎？惟成化刻本之說唱詞話各傳其流傳之時代在嘉靖元年前至少五十年，是其早於嘉靖本三國明甚，而其所敘之關索故事，又概與三國志傳各情節靡不相同。然則三國志傳之祖本今日雖未曾發現，吾人如謂其當在嘉靖之前，固不能視為無較大可能性者矣。

雖然，花關索傳之內容，文字實甚簡陋，且訛字滿紙，更多民間俗字，辨認常有蹇礙難通之處，惟就成化各本說唱詞話之語句語法成例時加比較，貫而通之，而後始得漸入坦途。今成化各本詞話皆已影印問世，可覆按也。成化說唱詞話花關索傳四種合為一冊，四種為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前集)，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認父傳(後集)，新編足本花關索下西川傳(續集)，及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貶雲南傳(別集)。前集末葉有牌子木記為“成化戊戌仲春，永順書堂重刊”。成化戊戌為1478年，早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刊刻年代四十四年，然此永順堂本尚稱“重刊”。永順堂在北京，其更早之刻本可能仍係南方之產物，此由全部成化說唱詞話之在嘉定發現之事實可證，故在永順堂本前更有較1478年為早之其他刻本，可以想見。

然則，此更早之花關索傳刻本(假定其內容與永順堂本無甚出入)更當在何時耶？吾人此刻一時實無多可供推斷之實質證據。趙景深先生“談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1972年文物第十一期)以為可推前一百餘年，學者多以為或有此可能。三國志傳一系統之文字，關索故事多與說唱詞話所敘者雷同，前已言之，然其文字雖亦粗陋樸質，遜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實仍視詞話本花關索傳為工細：花關索

傳則不惟其體製為說唱體，與志傳之為小說者不同，其語句口吻且益近白話，作風則粗獷豪邁之外，更有近乎言不雅馴，口沒遮欄者。如志傳同一系統之聯輝堂本三國志敘“關索荆州認父”時，關公遲疑：

索入見關公，雙膝跪下，垂淚言曰：“兒得大人之遺體，未嘗侍奉，不孝之甚，望父恕罪。”關公正容曰：“汝何人，敢來錯認吾耶？”索曰：“兒三四歲時，見父不在家，常問于母。母道父親自殺本處豪霸，逃難江湖，雁杳魚沉，不知所在，又值家貧，只依外公胡員外家撫養成長，指教說父昔日桃園結義，今聞在荆州，特來尋見。”關公遲疑不信。索曰：“父不認兒，兒無所倚。”哭昏于地。

說唱本之花關索認父傳敘關索見父不認，則嗔怒而言：

關索心下怒生嗔：看你今朝那裏去，
如何不認自家人？好生今日認兒子，
做個遮槍付劍人。若是言聲言不認，
橫山落草做強人。投了大國曹丞相，
領起干戈動戰爭。來打興劉鐵脚寨，
拿捉官員五虎人。

志傳系統之文字，雖能吸收說唱本花關索傳之材料如言關索“七歲時元宵玩燈，關中迷失，索員外拾去，養至九歲送與班石洞花岳先生，學習武藝，因此兼三姓，取名花關索”（皆聯輝堂本文字），甚至關索因關演武藝，前後共娶三妻之情節，亦未悉加割棄，惟如上引此類銜口而出語無遮欄之文句，則猶付闕如。非謂志傳一派之作者或編纂者之腦中定無犯上作亂之意識也，蓋三國志傳之成立時代或當較花關索傳為稍遲，因得採用花關索傳之材料而整理之變化之，使得更趨雅馴而自致於士大夫階層讀者之前，坊間書賈廣為流傳，允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身，理或然矣。愚前撰“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拙文，嘗謂喬山堂本三國志傳一類文字之語句辭彙、體製文格，蓋有合於署羅貫中名之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一百十五回本水滸中之征田虎、王慶部分，一部分之現存大唐秦王詞話，隋唐兩朝志傳及殘唐五代演義傳，而可能為代表羅貫中當日之真實文字，而以百回本為代表之繁本系統水滸，及坊刻本三遂平妖傳之大部分，似皆不能認為羅氏之作品。至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愚則以為其出現實在三國志傳一系統之作品之後，而於文字方面，則又視前者為修飾，為加工。花關索傳之發現，其重要性為從此吾人確可證明明代萬曆、天啓間之若干三國志傳刻本實有其較早之祖本，因而可以在小說史上提前三國志傳之產生時代，益可研求其書與羅貫中間之關係。拙文所述，大體言之自然仍

僅一種推測，惟此種推測似尚有其若干似可連續之環節可以尋求，若干文字版本上之旁證可以對勘，是則更有待於當世諸賢之爬羅剔梳善為之釐正補罅祛疑者也。

〔附 記〕

草此文前，曾獲見王利器先生撰“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文（三國演義研究集，成都，1983）。王先生舉知不足齋鈔本趙寶峰先生集卷首之“門人祭寶峰先生文”內寶峰（趙偕）門人名單，有羅本之名。此名單又為宋元學案卷九十三“寶峰學案”之所本。王先生更舉水滸全傳第二十七回內有東平府尹陳文昭，為正直賢明大受作者贊揚之良吏，而歷史上之真實人物陳文昭復嘗向寶峰請業，執弟子禮，寶峰更嘗以治民事宜告文昭。陳文昭名麟，永嘉人；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三有“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志並序”，記陳麟卒於明洪武元年戊申（1368）。王先生蓋以水滸之有陳文昭名為內證，足徵明版各種小說之題貫中羅本者，此羅本與趙寶峰門人羅本為同一人。愚按王先生此文所有之發現甚為重要。由其所提示之證據吾人所得從而詳究之者，或有數端：（一）趙寶峰為元末傑出之理學家，此寶峰門人之羅本當為儒林中人，即後世之所謂高級知識份子，就當時社會一般常情言之，或不肯撰質樸粗糙之講史文字，如署名羅本貫中之若干小說之所為。然如坊間小說之編纂者，假羅本之名而利用之，則事仍有可能。雖然，賈仲名固嘗親識羅貫中其人，仲名撰錄鬼簿續編中僅言其“樂府隱語，極為清新”，未嘗言其以理學名世。既有王先生之新發現，吾人或當進一步考察寶峰學案一派諸人之事蹟文字，試為覓求其佐證或反證。（二）若寶峰門人之羅本確與三國志演義小說之撰述有關（例如其或偶得粗糙之坊本如三國志傳之類而從事為之修潤），則其所撰述修訂之文字當近似比較工細之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而不近三國志傳。（嘉靖本與三國志傳文字校勘方面之比較，可參閱前引羅貫中講史小說拙文。）然嘉靖本之出現實在羅貫中（小說作者）或羅本（理學家）之後逾百年，苟其本為知名之理學家羅本所作，其刊刻或不致如是之遲。（三）陳文昭之名字在水滸中發現，固然甚有意義，然其意義愚以為當在王先生之考證確實證明小說中之陳文昭為一有確定時期之歷史真實人物（據墓志當為1312-1368），可以為吾人以後考證水滸等書之一具體線索。然水滸與三國間之關係則吾人仍待細研，而在水滸本身，則水滸全傳第二十七回自屬繁本水滸之一系統，而水滸繁本究竟與羅貫中之關係奚若，似仍非一時之研尋即可以遽加決定。水滸繁本之成立大約亦在嘉靖間，其刊刻成書即使稍遲於嘉靖本三國，相隔亦不致過遲。易言之，陳文昭之名字之在小說中出現，實在文昭歿後之數十年間，可能為撰寫水滸繁本之書會中人所汲取。且文昭之名除水滸外，其他小說亦頗習用之，成為循

吏賢使君之代名詞，初不止繫本水滸一處也，而在水滸之所謂“簡本”，即愚以為其行世或在繫本系統之前者，則尚無所聞。然則文昭之名之在何一時期始寫入水滸中而成為小說人物，與將此人物寫入水滸者應為何人，似皆當為吾人研求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之新課題。職是之故，吾人尤不得不深謝王先生之新發現，並可循此線索，更為求備之探討與鑽研者也。

〔附 記 二〕

前記伍伯事，後漢、三國間之慣用語也。人間既有此職位，寢假又有所謂地下伍伯。三國志卷十四“蔣濟傳”裴注引列異傳云：

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誣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痛〕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佛教入中國盛時之前，中國人死後，常言魂攝於泰山府君。及佛教來，泰山府君遂漸為印度之閻羅（閻摩羅）王所代替，人之所敬畏者，死後所無法避免之閻羅王是也。（如韓擒虎豪語言人生之志願，“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是。）民間信仰既攙佛教，較低級之通俗信仰遂有十殿閻羅之說。然十殿中雖有閻羅王，仍有泰山王，後者實即泰山府君之衍化。列異傳託名曹丕或張華作。蔣濟為領軍將軍在齊王曹芳即位之後，曹芳在明帝曹叡景初三年（239）正月丁亥朔立為皇太子，是日即位。曹芳為明帝養子，或云任城王楷子，楷則任城威王曹彰之子也。無論芳或楷子皆曹丕之孫輩，是曹丕撰列異傳似無可能性。然無論如何，三國至西晉泰山令之信仰具在，今且有伍伯，其地位在錄事下，能使人憔悴困辱。人間之伍伯亦將毋同？此固裴注所引列異傳此條可以證明者也。

WU PO AND KUAN SUO

LIU TS'UN-YAN

For many years the author has been holding the view that the several extant editions of the *San-kuo chih-chuan* 三國志傳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Three Kingdoms), published during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though coarse and and sketchy as they ar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they had been suspected by both Professors Hu Shih 胡適 and Sun K'ai-ti 孫楷第 to be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San-kuo chih t'ung-su yen-yi* 三國志通俗演義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rinted in 1522 in 240 items), are works reprinted from an even earlier edition or editions of the *San-kuo* which were in fact the prototype of the 240 itemized Romance. (Cf. hi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Romances of Lo Kuan-chung" included in the *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E. J. Brill, Leiden, 1984.)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ingles out two names from the *San-kuo chih-chuan* to further prove his point. One of the names he cites is Wu Po 伍伯, generally taken as the name of a general assisting Marshal P'ang Te 龐德 in his battles against Kuan Yü 關羽 or Lord Kuan. In the *Chih-chuan* version wu-po was a common name meaning merely an aide de camp. The author gives several examples taken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ies *San-kuo chih* 三國志 and *Chin-shu* 晉書 to illustrate the true meaning of wu-po as well as to show that the *Chih-chuan*, being of an early origin, is historically more accurate. Another name he cites in this article is Kuan Suo 關索, a son of Lord Kuan, whose spectacular happenings and heroic deeds are fully described in the *Chih-chuan*. The early origin of the *Chih-chuan* is proved clearly by a similar account of Kuan Suo portrayed in the *Hua-Kuan-Suo ch'u-shen chuan* 花關索出身傳 (The Complete Story of Hua-Kuan-Suo) published in the Ch'eng-hua 成化 period (1471). The latter was discovered incidentally in the late sixties in the vicinity of Shanghai.

In a postscript the author mentions a recent discovery made by Mr. Wang Li-ch'i 王利器 who found that in a long list of disciplemourners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funeral of Chao Chieh 趙偕 (*alias* Chao Pao-feng 趙寶峯), a Neo-Confucianist who lived in late Yüan (biography in the *Sung-Yüan hsueh-ah* 宋元學案), the name Lo Pen 羅本 (probably Lo Kuan-chung who had an identical given name) is include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finding is extremely interesting, though it would need more concrete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a case.